

《二泉映月》险些失传



无锡阿炳墓地,墓碑由参与记录《二泉映月》的杨荫浏先生题写。

1949年冬天的一天,我去储先生那里上课。因为天冷,正式上课前,我想先活络活络手指,无意间便拉出了后来定名为《二泉映月》的这首曲子的某一段旋律,并顺势拉了下去。在一旁的储师竹先生听着听着,认真起来,不待我拉完,忙说:“停一下,停一下,这是什么曲子?”我回答说:“这是我们无锡的民间艺人瞎子阿炳上街卖艺,边走边拉的曲子。”“这是什么人作的,曲名到底叫什么?”储先生步步紧逼。“我也问过他好几次,他老是说瞎拉拉的,没有什么名字。”我这样回答。

储先生大感兴趣,要我专门聊聊阿炳,我把阿炳的家庭身世和坎坷经历简单地讲述了一遍……谈话间,杨荫浏先生正好进来,他听到我们在谈阿炳,也插进来说:“你们说的这个华彦钧,也是我的琵琶先生,我11岁就向他学过琵琶,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但已经是无锡城里有名的音乐道士了;此人确实有才华,他双目失明后,我还曾向他讨教过梵音锣鼓。”

我向两位先生介绍,此时阿炳已长期在家休养,时常吐血,靠卖些治

“丹毒”的草药偏方,加上同居的女人董催弟(很多地方写成董彩娣,但应该是董催弟)的孩子接济,勉强糊口度日。

杨先生听完后,深为其忧,要我下次回无锡后,代向阿炳问好,并关照我要设法尽快把阿炳的曲调全部记录整理下来,不能大意失荆州,再耽误恐怕就来不及了,一旦失传会抱憾终身!

这年清明,我回无锡见到了阿炳,转达了杨荫浏先生的问候。寒暄过后,我向阿炳提出要听他拉一曲,并且指明要听他以前每晚边走边拉的那支曲子。阿炳几番辞谢,但经不住我一再央求,终于拉了。这首日后名扬中外的暂时无曲名的二胡独奏曲的初稿就这样形成了。

回到南京后,我把记录的曲谱请两位老师审阅。两位老师问我,阿炳是否还有其他二胡曲,我说不但有,还有琵琶曲。我以前就想自己出钱陪阿炳去上海唱片公司灌唱片,但他不肯去。我向两位老师提出,曲谱记得再好,也无法记录他高超的演奏技巧,最好把音记录下来。杨先生听后说,他最近看到一

份音乐资料,说国外已有携带式钢丝录音机,如果音乐院有的话,就尽快去无锡。

没过几天,南京和无锡同时宣告解放了。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所,杨荫浏先生任所长,杨先生的表妹曹安和教授和储师竹教授任研究员。约莫是在1950年6月,储师竹先生告诉我,音乐研究所已配发了从外国进口的一台携带式钢丝录音机。

我立即写信给杨荫浏先生,反映阿炳身体很差,建议速到无锡录音。杨先生回信,称暑假就来。我把这个消息转告阿炳。阿炳听说要为他录音,只说这是混饭吃的玩意儿。我反复劝说解释后,阿炳才勉强同意:“免得扫你们的兴,说我阿炳勿受人抬举,让我试试再决定吧。”

1950年8月下旬,杨荫浏、曹安和两位先生回无锡过暑假。到了之后,要马上与阿炳约定录音日期。阿炳练了几天,以便录音时更有把握。录音场所就定在公花园旁边的三圣阁内。9月2日晚上七点半,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先生在三圣阁内静静恭候着阿

炳的到来。阿炳到后,录音机启动,钢丝带缓缓地转动起来,大约五分钟后,阿炳在最后一个“5”音上习惯地将一指从高音区滑向琴筒处,以示全曲终结。从陶醉中醒来的杨先生带头鼓掌,连说:“太妙了,太妙了!难得啊,难得!”

“自病自知,我手上功夫已不如从前,见笑了。”阿炳摇头谦虚。

杨先生向阿炳询问:“曲名叫什么?”

阿炳回答没有名字。杨先生坚持要有一个名字。

想了很久,阿炳说,那就叫它《二泉印月》吧。

杨先生向阿炳提出:“印月的‘印’字,改成映山河的‘映’字可好?”阿炳欣然同意。

由此,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民族音乐瑰宝,正式展开双翅,将伴着它的作者一飞冲天了。可惜的是,1950年9月2日第一次为阿炳音乐录音,当年的12月4日他便因病去世了。

(编者注:新中国成立以后,黎松寿在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担任音乐系教授。2010年5月,黎松寿在南京去世,享年89岁。)(据《北京文摘》)

1950年12月,瞎子阿炳因病逝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阿炳的《二泉映月》和他的音乐遗产差一点随他的患病离世而失去,是当时一位在南京求学的无锡学生黎松寿偶尔试手,才被专业人士发现。后来担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的黎松寿,曾在生前回忆《二泉映月》最初版本录音的故事。

我和阿炳认识,直接原因是住得很近。我们家住无锡城里的图书馆路4号,与30号阿炳所在的雷尊殿近在咫尺。

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音乐,我父亲60岁还在学拉小提琴。我上小学时,父亲就为我买了把高档次的老红木二胡让我练琴。因

为在音乐上有共同语言,又住得近,所以我们一家和阿炳交往较多。

当年只要一踏进崇安寺山门,就能听到阿炳的胡琴声,崇安寺里很闹,声音很杂,但是什么声音都压不住他的琴声。阿炳的二胡声有股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瞬间便能引发听者心灵的共鸣,使你的心潮随着乐曲的旋律而起伏荡漾,听过他演奏的人无不有着“一曲难忘”之感。可是这位身怀绝技的超人,在旧社会里始终湮没无闻,没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

1946年,我到南京,在下关火车站工作。同时和杨荫浏先生的同事、著名二胡演奏家储师竹先生学二胡。

聂耳是否死于暗杀?

1935年7月17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海岸监视所,忽然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的是一名叫滨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鲜男子。他们非常焦急地告诉警察:一位和他们一起在鹤沼海水浴场游泳的中国人,在海岸边失踪了。

失踪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1点半。滨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大约3个多小时,依旧没有找到,所以报警。

根据记录,那名失踪的中国人,叫作聂守信。

第二天,7月18日的上午,滨田宏子和李相南再一次去海边寻找无果后,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国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捞上来的。根据法医检验,死者游泳时溺亡。

不久后,中国男子的

一名叫张天虚的好友赶到,打开棺木,确认了死者身份。

“聂守信”,是这名中国男子的学名,他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聂耳。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电影说的是知识分子投身抗日的故事。田汉写好了一首主题歌的歌词,但他那个时候因为“宣传赤化”,被国民党当局派人抓走了。在被捕前,田汉把这首歌词抄在一张香烟的衬纸上,夹在了剧本里。

剧本随后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发现了这首歌词,并告诉了聂耳。聂耳看了歌词,一拍桌子:交给我!我来作曲!

聂耳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写出了曲子的初稿。但正在此时,传来了当局也准备抓聂耳的消息。根

据组织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再由日本去苏联。

1935年4月,聂耳到达日本,随后三易其稿,写好了那首主题曲的曲谱,寄回国内。然后聂耳就在好友李相南(真实身份是朝鲜共产党员)的陪同下,到他的朋友滨田宏子家去度假。

聂耳寄回去的曲谱上,题目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当时百代唱片的投资人朱庆澜在这三个字前又加了三个字“义勇军”,《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

两个月后,却传来了聂耳与友人在海边度假,不幸溺亡的消息。

关于聂耳的死因,其实有争论。

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请郭沫若来写墓碑文。郭沫若写的话里,最后两句是:“不幸而死于敌

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明显透露出一种质疑。

巴西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安德拉德当时写了一篇散文《杰出的音乐家》,在文中他这样写道:“聂耳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是的,聂耳很清楚,他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敌人很可能暗杀他……聂耳还是小青年,只有23岁。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死了。在检查了一具流血的尸体后,日本警察正式发表看法说他是溺死的。”

尤其是,聂耳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头部和鼻孔都有轻微流血现象,使得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聂耳当时是七窍流血,是日本人认为他宣传抗日,派人杀死他后抛尸大海。”

真的是这样吗?目前所有的证据,都不能支撑

这一说法。

首先,聂耳虽然当时写了一批传唱很广的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作者是聂耳,聂耳当时作为一个业余作曲家,名气绝没有大到日本特务要派人暗杀的地步。当时聂耳虽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秘密加入的,几乎没有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去日本也没用护照,用的是一张学生证,上面写的是“聂守信”名字,日本人也很难知道他的身份。其次,即便知道聂耳的真实身份,当时流亡在日本,名气最响的郭沫若,日本警察也只是“监视居住”。当时中日也没有全面开战,日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暗杀一个当时其实不算有名的聂耳。第三,聂耳在日本期间的日记后来全部曝

光,没有任何表示自己被特务跟踪的记录。第四,当时聂耳的同乡挚友张天虚从头到尾参与了聂耳的认尸到入殓的全过程,他后来所有的回忆录和文字,都没有提到怀疑聂耳是被日本人暗杀的。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曾多次与聂耳在上海一起游过泳他的朋友孙瑜、金焰、吴永刚、赵丹、黎锦光等人,都回忆说聂耳的游泳技术不高,不会换气,经常沉底,因此有着“潜水艇”的外号。而根据滨田宏子的回忆,当天她带着自己的儿子在浅水区游泳,而聂耳去了深水区。

根据游泳专业人士的经验,他们救过的一些溺水的人,确实会出现口鼻有轻微出血的现象。说聂耳是被暗杀,证据确实不足。(据《北京文摘》)